

臣僕

〔德〕亨利希·曼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臣 僕

〔德〕亨利希·曼 著

傅惟慈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HEINRICH MANN
DER UNTERTAN

本书根据 AUFBAU-VERLAG BERLIN 1959 年版译出

臣 仆

[德]亨利希·曼著

傅惟慈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6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6.125 插页 2 字数 334,000

1979年8月第1版 197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88·65 定价: 1.55 元

关于《臣仆》

《臣仆》的作者亨利希·曼是现代德国的一位著名的作家、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亨利希·曼于一八七一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几个月之后生在古老的北方商业城市吕贝克的一个大商人家庭。他年青时就死了父亲，人文中学毕业后曾在德累斯顿当过书店店员，在柏林费舍尔印书馆作过职员。后来，他在柏林和慕尼黑念过大学，但不久就专门从事写作。一八九三年第一次旅行法国；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他后来的世界观的形成和文学创作都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一八九八年前，亨利希·曼和他的弟弟托马斯·曼主要生活在意大利；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给了他不可磨灭的印象。回国后，他先住在慕尼黑，后定居柏林。他曾从正直的民主主义者和战争反对者的立场出发热烈欢迎德国一九一八年的十一月革命。开始，他对魏玛共和国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以大资本家和容克地主的利益为根本利益的假民主，使他逐渐认识了资产阶级的真面目。于是，他便以激烈的政论家的姿态出现在德国文坛。亨利希·曼从一九三〇年起担任普鲁士艺术科学院创作协会主席，一贯坚持人文主义的文化主张。他大声疾呼

地反对军国主义的复活，大国沙文主义的强权政治和法西斯主义的野蛮行径。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后，他经过布拉格流亡到法国。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禁止他的作品流传，焚毁了他的著作，开除了他的国籍。亨利希·曼在担任旅法人民阵线委员会主席期间，同德国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无党派知识界人士以及资产阶级政治家一道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一九四〇年他又从法国逃亡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九五〇年三月在加利福尼亚逝世。

亨利希·曼是德国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到本世纪四十年代末，写下了大量文学作品。

他早期的长篇小说《在懒人的乐园》(1900)，以讽刺的手法，无情地鞭答了德皇威廉二世时代的柏林交易所和新闻界，谴责了容克资产阶级的专制政体，批判了普鲁士军国主义反动的思想体系，在艺术上则反对了风靡一时的颓废派文艺。长篇小说《翁拉特教授》(一译《垃圾教授》，1905)抨击了普鲁士专制主义下的教育制度，市侩习气和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道德败坏。在此期间，他还写了长篇小说三部曲《女神》和描写法西斯分子执政前的意大利的长篇小说《小城》。亨利希·曼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帝国》(《臣仆》、《穷人》和《首脑》)大部分完成于一九一八年革命前夕，这是一部无情地揭露德帝国主义社会制度的讽刺巨著。亨利希·曼一直热情地投身于现实的政治斗争之中，政论文章在他手中成了犀利的武器。他在国内外上百种报章杂志上发表的政论、杂文、讲演后来有

一部分编在《权力和人》(1919)、《理性的独裁》(1923)、《七年》(1929)、《精神和事业》等文集中。这些短文充满着反法西斯的战斗精神,题材十分广泛,体裁也很新颖。一九四四年,亨利希·曼撰写题名为《观察一个时代》的自传时,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这是作家世界观发展的一个飞跃。流亡国外的年代是他同法西斯主义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的年代。他这个时期的政论集《天亮》(1936)和《勇敢》(1939)渗透着战斗的人文主义精神,对法西斯主义行将灭亡充满着信心。长篇小说《亨利四世的青年时期》(1935)和《亨利四世的完成时期》(1938)是亨利希·曼最成熟的作品,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以卓越的艺术技巧,表现了正义对反动的胜利,指明了侵略者的必然失败的可耻下场,象征着反法西斯的人类进步势力即将胜利的光明前景。亨利希·曼从开始写作起,一直到晚年,从未停止过创作短篇小说。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他先后发表了五十五篇短篇小说,短篇集有《奇迹》(1897)、《笛与剑》(1905)、《暴风雨的早晨》(1906)、《清算》(1924)、《心灵世界》(1932)等。此外,他还写了剧本《雷格罗斯太太》(1919)等作品。

亨利希·曼生活在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里,他走上文艺创作道路的年代,正处在世界各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阶段。德国的情况也不例外,垄断资本在形成、发展。统治阶级首先向国内人民进攻,然后再向外扩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物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背叛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成为机会主义分子和资本的附庸。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反动的哲学家尼采提出超人的理论,种族仇视和反犹太主义,

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思想大肆泛滥。反映到文学艺术领域，则是优良的传统被抛弃，现实主义遭到践踏，颓废派艺术泛滥一时。神秘主义、色情文艺、唯美主义、唯我主义充斥整个文坛。罗曼·罗兰通过他所塑造的人物克利斯朵夫的口说得好：“痛苦的兽性的淫欲、杀人狂、强盗行径、陋风恶习、犯罪行为，——这就是隐藏在德国颓废派艺术深渊中的危险。”不管颓废派各种艺术流派如何自我标榜，称自己是什么新浪漫主义、新古典主义、印象主义或是象征主义，也不管他们的辩护士如何寻求美丽动听的词句来为它们自己粉饰，颓废派艺术只能证明一点——资产阶级时代正在走向衰亡。就在德国文坛的这一派乌烟瘴气中，亨利希·曼用自己的作品捍卫和发展了十九世纪德国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同颓废文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长篇小说《臣仆》写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但由于受德国书报检查机关的限制，直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以后，《臣仆》才得以问世。一九三一年，作者将两部续篇《穷人》（1917）和《首脑》（1925），同《臣仆》合在一起组成《帝国》三部曲。

从三部曲的标题和结构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家的写作计划是非常庞大的。亨利希·曼以独特的艺术手法给读者提供了一幅威廉二世帝国的图画。这部巨著出色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德国社会当时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第一次出现在亨利希·曼的作品中。

早在他着手创作《臣仆》的六年以前，亨利希·曼就写了

短篇小说《凯特新》。现在我们在《臣仆》中看到的主要人物，都曾出现在这个短篇小说里。从这一点看，作家写《臣仆》是非常严肃认真、费尽心血的。这就好象歌德在写《浮士德》之前就写了《原浮士德》一样，为创作出一部杰作，作者事前进行了长时间的生活积累、构思、酝酿，并精心地进行了试作。

《臣仆》被誉为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堪称亨利希·曼的杰作。

亨利希·曼在《臣仆》里塑造了以赫斯林为中心的一系列典型人物形象，这简直就是一个现实生活的画廊，凡在当时社会上曾经活动过的人物都维妙维肖地展示在读者的面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主要阶级的最本质的特征都被勾画出来了。

小说的主要人物是狄德利希·赫斯林。这是一个德国中等资本家的典型形象。读人文中学，上首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继承遗产，门当户对地结了婚，——所有这一切都是德国中等资产阶级人物的必经之路，也可以说是带有典型性的生活内容。尽管赫斯林只不过是一个小型造纸厂的老板，但是作家把德国资产阶级的主要特征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使他成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赫斯林首先是一个资本家。他考取博士学位，既不是为了找个职业养家糊口，也不是为了研究学术促进科学的发展。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追求金钱势力。正因为他无保留地拜倒在财富和权势面前，所以他就必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奴才。只要有了钱，只要有了权，他什么都可以抛弃。他刚一掌握了工厂的大权，就头脑发热，忘乎所以了。无论是诗歌，或者是

哲学，在他看来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对他说来，恭顺地、盲目地、无条件地服从皇帝就是最美的“诗”，夺取财富和权力就是最高的“哲学”。然而，正是他绞尽脑汁地想出了生产印有皇帝名言的“大德意志帝国”牌纸张的新花样。谁说他一点发明创造也没有？他对于吹牛拍马、阿谀奉承、趋炎附势还是满有一套本领的。

《臣仆》两字集中表现了赫斯林的性格特点：奴隶根性。这是德国资产阶级的先天弱点。中世纪末叶各普鲁士公国的市民阶层的驯良恭顺，一八四八年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背叛革命，直至俾斯麦以“铁血政策”统一了德国之后资产阶级的卑躬屈节，德国资产阶级一脉相承地表现出对君主政体的拜服和对革命的恐惧。赫斯林无限忠于德皇的奴隶根性充分反映了整个德国资产阶级的这一本质特征。

但是赫斯林不仅是奴才，同时他又是一个暴君。就其深刻的内在本质而言，他是奴才、暴君二位一体的人物。这两者看来截然相反，实质上却是同一性格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渗透到他的血液和骨髓，支配着他的每根神经。在德皇面前，在专制主义的“神圣秩序”面前，在一切压倒他的反动势力面前，他放弃自己的个性，甘当奴才，就象触到蛇蝎一样本能地缩回他的双手，拱手拜舞。正象亨利希·曼尖刻地指出的那样：对于赫斯林之流，“甘当奴才——这就是自由。”但在家庭，工厂，在一切弱小者面前，他又凶相毕露，俨然如同一个暴君。赫斯林看起来愚蠢透顶，但是为什么他能够事事如意、青云直上呢？它的根本原因，就是他曾公开说出的一个秘密：要想成功，“必须成为坏蛋”。在当时人们称为“被加冕的傻瓜”

的那个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正是赫斯林这样的蠢货加坏蛋的乐园。

赫斯林这个奴才兼暴君的资本家，决不只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形象，他是帝国主义时代德国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和亨利希·曼以前作品中的资产阶级人物形象不同，赫斯林对人们的阶级地位和政治倾向认识得很清楚。他知道该恨谁，也知道为什么要恨。他认为德意志“神圣秩序”的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工人。在谈到参加游行示威的工人时，他曾凶相毕露地说：“该用大炮来对付！”他憎恨社会民主党人，憎恨自由主义者，——一句话：对一切在思想和行动上跟他不同的人，他都憎恨。从获取最高限额利润的欲念出发，他披着民族主义的外衣，蛊惑人心，极端仇视进步人类，仇视几千年来的人类文明。他张大着血口要吃人，他挥动着利爪要毁灭文化！这就充分暴露了赫斯林作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前身的狰狞面貌。这也正是亨利希·曼所塑造的赫斯林这个典型人物的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所在。

到了十九世纪末，在奈泽西，普鲁士公国的古老静谧的小城风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奈泽西是一个乌七八糟、腐朽不堪的小城。遍及各个角落的是资本竞争、投机倒把、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奈泽西就是帝国的缩影，而这个主宰奈泽西城命运的“保皇党”的代表人物赫斯林，也就是威廉二世的化身。

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德国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期间，随着工人运动的日益迅猛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大批地涌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构成了党内右翼的

基本力量。恩格斯逝世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势力逐渐占了统治地位。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头子提出“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他们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宣扬阶级调和，鼓吹议会道路，最后竟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法西斯主义的走狗。小说里的非舍尔就是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的叛徒。他是一个出身于小市民阶层的工人，奈泽西地方社会民主党的所谓“领袖”。非舍尔根本不关心工人的疾苦，他的思想和行动相距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何止十万八千里！他的灵魂发着铜臭，他的一切活动都是出自利欲熏心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动机。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他和赫斯林在议会选举前达成默契，丝毫不感到突然和意外。非舍尔和赫斯林走的道路不同，目的却只有一个——都是为了追求财富和权势。

小说里的自由主义者也是作家着力描写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出现了两代人。老布克被描写成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革命时代遗留下来的代表人物。作家通过这个老自由主义者的形象抒发了他对德国革命失败的悲痛。老布克和其他自由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品格端正，蔑视对现存制度的妥协。然而，他只是一个堂·吉珂德式的空想家，而不是一个战士和革命家。他的儿子，年青的布克，则是当时的自由主义者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信念模糊，象钟摆一样摇摆“在拉萨尔和俾斯麦之间”，梦想做大官和工人“领袖”。到头来选定了演员的职业，仍不知怎样行动才是自己的准绳。老自由主义者也好，年青的自由主义者也好，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需要憎恨和行动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只停留在不满现

状、空发议论的阶段上。以老布克为例，他的志向也只不过是办什么贫民食堂、育婴堂，尽尽自己作为“人民的担忧者”的义务罢了。他甚至看不出赫斯林是他的敌人，却在市议会选举时表示支持赫斯林。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发展没有什么妨碍，但对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事业却起了绊脚石的作用。

老布克之死，写得极其精采，不仅寓意深刻，而且富有艺术魅力。在老人临死前的最后一分钟，赫斯林出现了。老布克咽气时怀着痛苦和恐惧，赫斯林的来临则充满欢乐和希望。死了老布克，留下赫斯林。这象征着历史的一幕：十九世纪的德国自由主义已经消亡，二十世纪的最黑暗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正在崛起。

小说结尾时，安排在举行威廉一世纪纪念像揭幕典礼上的暴风雨场景，除了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外，还表现了作家对现存制度必将灭亡的预见性。如果说，赫斯林先前满怀臣仆的狂热跌进了水坑，那么，现在陷在水坑里的已不只是一个忠诚的臣民赫斯林，而是包括主子和奴才在内的所有的人，也就是帝国的整个的“神圣秩序”。

《臣仆》这部名著的艺术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它的语言既精炼，又生动、鲜明。它的剪裁独具一格，小说的情节，象电影段落一样，一个场景一个场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连续而跳跃地向前发展，使读者身不由主地被吸引到作家所描绘的境界里去。作为一部讽刺小说，作家只须几笔就勾画出一个富有特征的形象来，使人不仅一眼就能看清它的外貌，而且能透过外貌洞察它的本质。仅以描写赫斯林模仿威廉二世留的两撇上

须为例，说他一撇嘴两撇上须就象剑一般刺向他的眼角，这就不仅活龙活现地描绘出了他的外形，同时也刻划出他的内心世界——对主子的崇敬和拜倒。类似这样的漫画式的笔调在书中不胜枚举，大多能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我们说，作家塑造赫斯林的成功主要表现在如前所述的典型意义上，人们看到了他，了解了他，无不感到可憎，象对他的名字赫斯林——可憎的家伙——的本意的了解一样。作家塑造赫斯林的成功同时也表现在赫斯林的荒诞可笑上。当他充满臣仆的狂热诚惶诚恐地拜倒于他的君主的脚下时，我们看到他是个十足的小丑；当他忘记了自己蜜月旅行的最初目的，却着了魔似地整个意大利坐车追随这个君主并充当义务守卫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不只是个小丑，还是个十足的奴才；当他在纪念像揭幕典礼上热情地演说由于暴风雨的袭击而吓得躲藏到讲台底下的时候，作者的笔锋就更深入一层，不只描绘了赫斯林这个卑鄙、可笑的形象的外形，而且刺入了他的本质——渺小怯懦、外强中干的丑恶灵魂！

亨利希·曼的功绩在于他继海涅和维尔特之后第一个直接接触及被现代德国文学所回避的关于普鲁士专制主义的题材。它使作家的现实主义放射出特殊的政治思想性的光彩。

在《臣仆》中，作家向人民发出了警告：帝国主义势力日益猖獗，战争的乌云已经笼罩大地；也预见了旧制度灭亡的临近。但是小说没有指出摧毁和改造旧世界的使命已经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小说中虽然有无产阶级出场，但并没有被表现为自觉的战斗的阶级，而是被写成了忍辱负重的受苦受难的大众。这反映了民主主义作家亨利希·曼的阶级

和世界观的局限性。

《臣仆》是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从小说问世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十年。尽管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生活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目前在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小说中所描写的赫斯林、菲舍尔、布克一类的人物，在我们当代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迹。对我们说来，长篇小说《臣仆》，不仅是一座艺术性的历史丰碑，而且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

关惠文

一九七八年四月于北京

内 容 提 要

德国小城奈泽西纸厂小开狄德利希·赫斯林，自幼胆小怕事，欺软怕硬，既害怕权势，又追求权势。中学大学时代，更学会一套两面三刀、投机取巧的伎俩。大学毕业以后，正值父亲去世，他于是接替父亲当了纸厂老板，凭借趋炎附势、看风使舵的“本领”，混迹于社会，周旋于自由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谁掌权得势，他就倒向谁。时值威廉二世统治帝国，他就誓死效忠德皇，自称臣仆。就这样，他左右逢源，青云直上，不仅纸厂越开越大，而且当选为地方议员，成了显赫一时的人物。作者以辛辣的讽刺，揭露了帝国臣仆赫斯林的丑恶嘴脸，从而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帝国社会作了无情的批判。

第一章

狄德利希·赫斯林是个懦弱的孩子，什么都害怕，最喜欢的是梦想。他的耳朵常常闹病。冬天他舍不得离开暖和的屋子，夏天总是把自己关在狭窄的小花园里。这座花园散发着一股造纸厂的烂布气味；园里的金雀花和丁香树后面，兀立着老屋的木头骨架。有时候狄德利希正在读一本他所喜爱的童话书，偶然抬头一看，常常吓一大跳。紧挨在他身旁的长凳上，分明坐着一只癞蛤蟆，身躯足有他一半大！或者有个小矮人，下半身埋在土里，正在那边墙脚下斜着眼睛瞟他呢！

比小矮人和癞蛤蟆更可怕的是他的父亲，而且你还非得爱他不成。狄德利希倒是爱他父亲的。有时候他偷了嘴或是说了瞎话，他就吧哒着嘴，怯生生地在写字台边磨来蹭去，直到赫斯林先生发现了不对头的地方，从墙上把手杖取下来为止。每一件没有查对出真凭实据的坏事都使人们对狄德利希的忠诚老实产生一分怀疑。有一次，一条腿有些残疾的父亲失足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儿子象疯子一样拼命地拍巴掌——接着就一溜烟似地跑掉了。

有时候他刚刚被父亲教训了一顿，红肿着眼圈、哭哭啼啼

地走过工厂，工人们都大笑起来。狄德利希却立刻向他们吐吐舌头，跺跺脚。他心里想：“不错，我是挨了打，可是那是我爸爸打的，你们要是能挨上他的打，高兴还来不及呢！你们连挨打的资格也没有。”

他在工人中间象个喜怒无常的巴夏^①，一会儿恫吓他们说，要把他们搞啤酒喝的事向父亲告发，一会儿又听他们说一些恭维话，把父亲回来的时刻透露给他们，借以讨好。这些工人对厂主存有戒心，因为厂主熟悉他们，他自己也是工人出身。从前他在好几家用手工操作的老式工厂当过造纸匠。几次战争他都参加了，最后这次战争过后，人人都发了点小财，他买了一架造纸机器。后来又添置了一架荷兰式打浆机和一架切纸机，使工厂的设备逐渐完善起来。他亲自核对纸张的数目。从破衣服上拆下来的钮扣每一颗都得交给他。可是他的小儿子却时不时地偷偷接受女工们的馈赠，作为交换条件的是，女工如果带走几颗，他可以不再向父亲告发。日久天长，狄德利希的钮扣已经积攒了不少。有一天他居然起了个念头，想用这些钮扣向小贩掉换糖果。他果真这样做了。可是当天晚上，当他嘴里咂着最后一块麦芽糖跪在床上作晚祷的时候，吓得浑身直打哆嗦，祈求那可怕的亲爱的上帝，替他掩盖住这次罪行。上帝还是把他的丑行揭穿了。他的父亲一向动用刑杖都有一定的规矩，一张下级军官的饱经风霜的面孔总是摆出维护体面、履行职责的神色，这次却气得连手都哆嗦起来，一滴泪珠跳过颊上的皱纹，滚进他的一撮银白色的威廉皇帝式的胡髭里去。

① 巴夏——旧土耳其、埃及高级军事及行政长官的称号。——译者